

李天成

伪满洲帝国陆军军官学校

“满洲帝国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军校）是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下简称陆士）作为模式，1939年在长春（当时是伪国都“新京”）建立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为称霸亚洲，扩展侵略，在发展经济力量，注意提高国民教育的同时，重视加强陆、海军的建设，并依靠它的强悍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得以在二十世纪初，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

日本能够建立起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它非常重视军队干部的培养训练。陆士是培养日本陆军军官的“摇篮”，所有的日本陆军军官都必需经过这个“摇篮”的哺育。与陆士同样，为培养海军军官，成立了海军士官学校。在陆军士官学校之上有陆军大学，但是这个陆军大学不同于其它如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普通大学，它属于军队干部再深造的性质，要在陆士毕业后有了若干年作战经验的，才可进入。考入陆士者，也象考普通大学一样，要有中学毕业的学历。日本军官的社会地位很高，由陆士毕业被任命为少尉，即相当于日本文官的高等官，被视为“皇军之楨干，天皇之股肱”。陆士出身，幸免在战场上死去或患病身死者，随着年资的增长，皆能成为统率军队的高级军官。他们因为在青少年时出身于一个学校，受过同样的严格的艰苦的“科

班”训练，相互之间凝聚力极强，形成日本军部的坚强势力——军阀。这些人又相知甚深，有真才实学的，受到侪辈推崇，可以脱颖而出，没有因裙带关系而青云直上的。这些军阀不仅掌握军队，有的还进而出入政坛，组织内阁，操纵日本政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知名之士如东条英机、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冈村宁次、本庄繁、山田乙三、山下奉文等人都是陆军出身。日本的皇族、裕仁的弟弟高松宫、秩父宫也都在这个“摇篮”里滚翻摔打过。在日本国之外，也有一些名震遐迩的人，在这里留过学，如中国的蒋介石、何应钦。

日伪的苦心经营

日本“关东军”在占领中国东北之初，总共兵力只有1.04万人，虽然轻而易举地击溃了34万之众的中国东北军，但是若想消灭东北的抗日力量，“巩固满洲国的治安”，实现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这些兵力是不够的，还要组织伪满军，实行“以华制华”。对伪满军，日本人又不能十分信任，就从几个方面实行制约：一是从人数上控制，日本陆军省（部）在1933年8月制订《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规定“满军”人数不得超过6万人；二是在装备上限制，不允许“满军”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只准许设步兵、骑兵和工兵；三是从领导权方面控制，大量向“满军”中派遣日本人任军官，并训练东北的中国青年充任亲日的军官，向各个军管区派遣日本“关东军”的现任军官充任顾问。

由于自1937年7月起，日本先后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感到日本的兵源不足，限制“满军”的人数和装备的计划，不得不做了修改。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时，“满军”已经发展到15万人。在兵种方面，除步兵、骑兵、工兵之外，又增设炮兵、高射炮兵、汽车兵、航空兵、江上军等兵种。从1940年开始实行《国兵法》，规定年满19周岁的男性青年均要应征进行“国兵”检查，凡是体格检查和其它方面考查合格者，一律入伍。

服3年兵役。检查不合格者，一律出劳工，被称为“国兵漏”。因此伪满军士兵的来源有了保证，兵员的素质也有了提高。

对作为伪满军队的骨干军官的培养，日本下了很大苦心。在1939年设立了“满洲帝国陆军军官学校”，地址设在今吉长公路上长春近郊的拉拉屯，在石碑岭之下一片高岗之上，伪帝溥仪命名为“同德台”。

“军校”的入学考试极为严格，由“军校”统一出题，密封送往各军管区，委托他们在各省设考场考试。

报考“军校”者，须有“国民高等学校”（伪满的学制自1930年起将初中与高中合并为4年，称之为“国民高等学校”）毕业资格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年龄为17~18周岁。在学科考试方面，要考汉文、日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体格检查要求很高，不能有任何慢性病，脑、心、肝、肺、肾、胃肠、皮肤、骨骼、眼、耳、口、鼻要完全健康，自不在话下，视力必须在1.0以上，就是患有轻度沙眼的也在淘汰之列。报考者与录取者之间比例每年虽有不同，大体上是每7~10名取1名。

军校每年招生考试在各普通大学招生考试之前举行，发出录取通知书的时间，与各大学发表考试结果的时间仿佛，入学的时间约在第二年的二三月间。第七期生入学，因为当时战局紧张，提前在前一年末（1944年的12月初）入学。因为军校完全是官费，考试竞争激烈；又是以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为模式，毕业后的待遇又高于普通大学，所以每年的入学新生中都有一些同时被伪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工业大学、医科大学等录取了，但却放弃了另外的大学，而到军校入学的。

学习与训练生活

军校的学制为4年9个月。预科2年，“队附勤务”（到

部队实习)半年;本科2年;见习军官3个月。预科的学习内容:上午为普通学,下午为术科和军事学,使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编著的教科书和教材,“军校”自己只编印少量的辅助性教材。普通学有:历史、地理、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日文、汉文、作文、“建国精神”(“军校”自己编写的荒诞的讲述伪满洲国“建国理想”的教材)、法律、经济,与日本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相同。

军事学的内容是以日本军的《步兵操典》为主,日本军以步兵为军中之花,是资格最老的兵种,视为主兵。它的《步兵操典》的编著,是总结了日本军建军以来历次战争的经验,将一个士兵的战斗动作、战斗要领,一条一条地记述在上面,要求每个军官、军士、列兵对有关条款要背诵如流、执行不苟,认为它是军人前辈的“鲜血结晶”。此外还有《射击教范》、《内务令》、《作战要务令》、《通信学》、《兵器学》、《制图学》、《地形学》等。在预科期间,对军事学学习达到的要求是完全具备一个日本军人从列兵到曹长(上士)的军事方面的知识素养。

术科方面为《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内务令》、《作战要务令》、《通信学》等书本知识的实践化。制式教练从单兵徒手训练的立正、稍息、敬礼开始到使用步枪,学会所有的军人动作,一直学习到持枪战斗、指挥一个班的战斗。术科训练完全是日本“武士道”式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要按照操典上的动作和教官的示范,照做不误,稍有不合,立即拳脚相加。譬如教游泳课,是在夏季去大连的柳树屯游泳场。大陆的青少年有的过去没有接近过江、河、湖、海,根本不会游泳。日本人的“陆士”式的训练方法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用小船把这些不会水的学生载到远离海岸有几人深处的水域,一个一个地推到海中,看着这些不谙水性者,在水中挣扎扑蹬。见到有真正被水呛得探不出来头的学生,教官才从船上跃入水

中，把他拉上船来，让休息片刻，再面授几点要领，然后再把学生扔在海中。就这样，不消一周，就一个个的在海水中沉浮自如了。其它的术科的训练方法，也大致如是。术科还有实弹步枪射击、工兵作业、刺枪术、剑道、马术、体操、旗语联络。每种训练都是一丝不苟，要求个个及格，不准一个人滥竽充数。例如工兵作业中有水平投土科目，午饭后进入作业现场，按照规定动作挖掩体，至晚饭时挖好规定的大、小，深度，中间不能有一分钟停顿，土方要抛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挖土姿势不许改变。4个小时过后，个个手掌磨出血泡，腿、臂疼痛万分，就是这样，在集合返校时，还要摆出一副英勇姿态，步伐整齐，高唱军歌。

预科两年毕业后，到各个部队去服“队附勤务”，时间为6个月。到部队后，头2个月戴上等兵军衔，实习上等兵的各项任务。按伪满部队规定，士兵中最高军衔为上等兵，即光板3个星；其次为一等兵，光板两个星；最下者为二等兵，光板1个星。到实习的第3个月晋级为下士，1条线1个星；第五个月晋级为中士，1条线2个星，依次实习下士和中士的任务。6个月“队附”任务期满，以中士的军衔回军校入本科。

在预科毕业后，即划分兵种，分步兵、骑兵、炮兵、高射炮兵、工兵、辎重兵、江上军、航空兵、汽车兵等9个兵种。另有军需科，预科毕业后进入本科时，入“新京军需学校”。军医科，预科毕业后入哈尔滨军医学校。

学校中的日本人及朝鲜人学生，在预科毕业后去日本“关东军”部队服“队附勤务”，6个月后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

入本科后即分兵种学习。本科的统一学习的课程有战略、战术、战史、兵器学等。主要是精通一个排、一个连的战斗指挥，了解从营到团的指挥要领。术科按不同兵种学习各自的专业课程。本科两年毕业，毕业后授上士到部队任见习军官，时

间为 3 个月，然后任少尉。

“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当局为表示对军校的重视，在每年本科和预科生举行毕业典礼时，在大操场举行阅兵式，伪帝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率领文武百官检阅全校学生。溥仪着军便服，佩元帅肩章，表示他是全军的统帅。为溥仪单独摆一个检阅台，溥仪站在半米高的检阅台上，在他前面放一张桌子，桌面上蒙着白布。在溥仪检阅席的右面 5 米远，靠后 1 米则安置着与溥仪同样样式的“关东军”司令官的检阅席。本科和预科毕业生中考试获第一名者，由伪皇帝御赐奖品，本科第一名为军刀一把。

对派往军校的干部，名义上是由伪军事部提出人选，由伪帝敕命派任，但实际是由“关东军”决定的。第一任校长是日本陆士出身的陆军中将郭恩霖，但是不久，就改派日本陆军少将南云亲一郎（转任“满军”陆军中将）南云辞职回日本后，又命日军陆军中将山田铁二郎（转任“满军”中将），任最后一任校。长校长下设干事，为少将伊达寿郎。干事，相当于副校长的职务，管理学校的日常工作。干事下设教授部，部长由少将级军官担任，普通学的文职教授和军事学、术科的武职教官皆由教授部管辖。

日常的磨炼

自 1939 年开始，共招收 7 期学生，各期中有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前 3 期中，在预科毕业后，挑选一部分中国人学生派往日本陆士入本科（从第 4 期开始不再派）。对日本人和朝鲜人预科，毕业后全部送陆士入本科，军校的第一期相当于陆士的 5 期，军校第 7 期相当于陆士的 6 期。

预科的各连编成预科生队。溥仪觊觎军校这批力量，把他的弟弟溥杰、妹夫张挺（这两个都是日本陆士毕业，张挺是搞复辟的张彪的儿子。）派到军校任职。溥杰先是第三期生的预科连连长，后提升为预科生队队长，当时是陆军中校。张挺

任教官。

本科生队队长为陆军上校乔明远。

每个连的连长为少校，下设4个区队，一个区队三四十人，区队长为上尉或中、少尉。每个区队是学习、训练、生活的基本单位。

军校的学习、训练、日常生活都要求严格、认真、准时、效率，特别是在预科第一年时，为了打下基础，养成习惯，严格到严酷的程度。

军校学习陆士的传统，在预科第一年时，由预科第二年的上级生中派给每个区队一名指导生，指导生是学、术两科都过得硬者。指导生任期为半年，共派两期。指导生，除他们上学、术科课程回本连外，与一年级学生居住、生活在一起，为低年级作生活榜样。指导生半年一换，进入二年级就没有指导生了。

每一连是一栋连舍，连舍的一半是宿舍，一半是自习室。进连舍都要换拖鞋，拖鞋和换下来的鞋都放到鞋架的固定的格子内。高靱皮鞋的鞋带的系法都有一定的样式，脱下鞋后，鞋带都要抽紧，放在鞋内，两只鞋的摆放要整齐，不得一前一后，歪斜不正。

在室内走路，既要昂首挺胸，又不许脚步声重。

早晨起床时。每晚有值周生值班，轮值到起床钟点的值周生，听到校本部大楼的起床军号声响起，立即高喊“起床”。熟睡的学生就霍地跳下床，穿好衣服，换好鞋子，到连舍外面集合。在刚入学的前3个月，为了给新生打下“行动迅速、准确”的烙印，列队集合时，最后入队的人要捱打。一周之后，大家都被训练成快速的机器人了。

在通常情况下，起床后，有半小时的洗漱，整理内务时间。

饭前有早自习。自习室内，按区队，两个人对面安放书桌，排成一字长蛇阵。桌子上面放置一个书架，把教科书、笔

记本整齐地放进去。书桌有两个抽屉，不准开锁，一切公开化。书桌上放置一个阅览板，看书的时候，把书籍放在立着的阅览板上，同眼睛保持30厘米的距离，书的高度同正坐时的眼睛位置等高。阅读者个个都要正襟危坐，头正、颈直、挺胸，双手置于膝上，除翻书外，两手不得置于桌上。写字时也不准身子歪斜，脑袋过甚前倾。不管在任何场合，坐着时，不得架二郎腿，更不准抖动腿。每晚都要写《反省录》，检查一天的言行，交区队长阅看。早自习后早餐。用膳时，筷子为个人保管，每个人一个筷子盒，内置铝筷。每个人一碗饭一碗菜，不问饭量大小，一律平等。饭前要默祷，尽管因为战争物资缺乏，膳食恶劣，吃饭时也要显示出武士风度，注意姿势。日本人教官常常用“真正的武士即使饿着肚子，也要装作剔牙”来教育学生要不丢架子。先吃完的也不准离开饭桌，等到全区队的人全部吃完，方可到室外列队返回。

早餐后，做学习前准备工作，到自学室准备好当天学习的教科书、笔记、文具。

然后服装检查。学生背好书包，按连别集合，由值周军官带往大操场，全校师生集合在那里。由各连军官对学生进行逐个巡视检查，看着装是否整洁，精神是否饱满。然后由各区队带往教室上课。

上午授课至12点，在各个教室，学习普通学或军事学。一般的一堂课为50分钟，中间休息10分钟，上午可上4堂课。午餐后，下午上术科。体操、剑术、马术、野外教练均在这一时间。晚餐后，有一小时的自由活动。这个时间可以理发、洗澡、洗衣服、写信、去学生集会所，可以稍稍松弛一下一天的紧张生活。

然后晚自习。自习后准备就寝。

就寝时，一声令下，全部熄灯，各寝室不许再有人说话。

授课完全用日语，中国人教授也要用日语讲授（教普通学的中国人教授只有一位教化学的张教授）。

日常同学之间讲话，也规定要使用日语。但这种规定形同虚设，大家相互之间还是讲中国话的。

因为校园内面积广阔，宿舍、教室、饭厅之间距离较远，因此校方规定学生在校内来往，不论是集体列队还是单人行走，不准走路，一律跑步。但是集体列队行进，唱军歌时可以走路唱歌。

军校的学习、训练和日常生活的锤炼是照搬日本陆士的办法，而陆士的作法是把斯巴达、普鲁士的“尚武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揉和在一起，此外还掺杂一些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形成一套日本人引为骄傲的能代表日本人精神的冰冷、生硬、刻板的铁拳教育。在所有的教学和生活活动中，都灌输绝对服从、勇敢无畏、战胜一切、自重自信、快速果断、忠于信守的思想。这种冷酷的硬性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不是歧视性的专施于中国学生，对待日本学生也是同样。

日本战败后，军校毕业的日人（1～3期生），已经任命为伪满军中、少尉者，他们回国后，同日本军军官一样，按照美国占领军麦克阿瑟《整肃令》不能从事公职，不得不另谋出路。还没有毕业的4～7期生，在东北，一部分做为苏联军的俘虏，被送往苏联的西伯利亚劳动，一部份回国。成了战俘的那些人，一二年后也陆续被遣返回国。这些未毕业的军校学生，年纪较轻，又是学生身份，不在麦氏整肃之列，其中不少人又另考大学。这些日本学生在日本仍然保持着“同窗友情”的联系，他们组成的“兰花会”，每年均有集会。这些人对军校一段生活，仍然颇为怀念。

反满抗日思想与活动

由上期生向下期生派遣指导生制度是从陆士搬来的办法。陆士原来的构思，在学校的学生日常起居生活中，按照日本军人的要求形成的作风与传统，光靠教授和教官讲授是不够的，

还要靠年龄相仿的上级生作样子。陆士50余年的实践证实，这是一个好办法。“军校”拿过来之后，学校当局根本不曾想到其中一部分指导生，除了起到陆士传统的作用之外，还竟然成为传递反满抗日火把的人。指导生首先是教唱军歌。军歌中有从陆士那边传递过来的宣扬日本军人忠君爱国、强大光荣的日本军歌，还有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国军歌。其中有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

还有仿此而谱写的《满江红》：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涛大作，
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樊篱，
黑龙江畔列城郭，
到尔今外寇任纵横，风尘恶。
甲午役，土地割，
甲辰年，主权夺。
看江山如故异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
一战收拾旧山河。
待归来永作蓬莱游，
念弥陀。

此外还有十几首由上期生一期一期传下来的歌唱民族奋起、反抗外敌侵略的军歌，这些歌都是口传，从不写成文字。此外还有各期生自己创作的各期生歌，也都贯穿着抗日的思想。

指导生的另一任务是动作示范，行、走、坐、卧、吃饭、自习、整理内务、洒扫应对，都要求动作迅速、姿势正确、自励顽强、不甘人后。指导生传授这些，就要讲清目的。目的就是从日本人这里，学会做一个不亚于日本军的军官，做一个不亚于日本军校学生的中国军校学生。假想敌就是

日本军。

从第一期生入学开始，在军校学生中就产生一些反满抗日秘密组织，其中有以1期生吕天（当时名吕殿元）、崔黎夫为首的“恢复会”，3期生陈东升组织的“仙洲同盟”，军校教育部长陆军少将王家善组织的“真勇社”，此外还有“抗日建国青年军人会”、赵镜澜、王文萃等10人组织的“东北青年甦生联盟会”、邓昶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共产主义同盟会）等。

在学生和中国人的军官中，有人在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有本科二连连长少校邓昶和战术教官佟志杉。也有人宣传三民主义，如曾任过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张宝慈，在抗战时期在重庆，日本投降后曾任国民党沈阳市党部书记长，后去台湾，他的弟弟张宝仲是3期生，受乃兄影响，曾传播三民主义。邓昶是从哈尔滨军医学校转来的，任5期生本科二连连长，曾经在“精神训话”的课堂上几次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等问题。他在1931年开始组织“反帝大同盟”。在东北光复后，邓昶常率领一些军官学校和军医学校的学生参加东北民主联军（东北解放军的前身）。

1941年12月30日，日本人在东北全境搜捕抗日分子，军校学生崔黎夫、常吉、孟宪昌被逮捕、判刑，另一名学生陈东升被捕后撞火车牺牲。学生吕殿元遭到宪兵团传讯，这就是“一二·三〇”事件涉及到本校的情况。这一镇压事件发生之后，更加激起军校学生中的抗日怒火，秘密组织越来越多，在学生中传递的秘密书刊也多起来。1940年以后，伪满军的一些部队被“关东军”派遣到热河和八路军作战。这些队伍一与八路军接触，就听到八路军的宣传，受到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在军校预科毕业后，有一些学生被派到在热河的伪满军队中服“队附勤务”，6个月期满，回军校入本科。这些人回校，大部份都带回来八路军的宣传品，如《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

《游击战争》等小册子，在军校中流传。

当时在中、日、朝学生之间，中、朝民族都是被压迫民族，大家同病相怜，相互同情。中日同学之间，由于日本学生的父兄中有一些人是军国主义者，学校当局也优待他们，对这些十七八岁的日本青少年是有影响的，因而时起冲突。后来校方为了缓和矛盾，采取中日学生同住一个寝室，结为临床同窗、相互帮助的关系。这终究象主人的儿子与奴仆的儿子在一起一样，还是貌合神离。

这些年轻的日本学生，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牺牲品与受害者。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之后，“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即命军校校长山田铁二郎回归“关东军”的编制，指挥防守“新京”的日、“满”军。山田铁二郎将在校的日本7期生学生350人，编入日本军战斗序列。他们后来被苏联红军俘虏，作为战俘送往西伯利亚，过了几年战俘生活，方陆续被遣返回日本，重新投考学校，或另谋生计，其中有98名没有支撑过来，就葬身在异邦了。他们中有些人，在中日建交后重访中国，遇着旧日中国同学，一方面为他们父兄的侵华行为表示忏悔，也谈到他们自己在十七八岁时就作了一段战俘而热泪盈眶，到现在还不胜欷歔！

东北光复之后

军校是有武器的军事学校，绝大多数学生又有不同程度的爱国思想，所以当苏联一向日本宣战，军校学生便和中国人连长、区队长（他们是学生的教官，有的还是前期同学）在一起，不听从学校当局日本人领导的命令，打开武器库，自己武装起来，拥护平素信任的连长和区队长为临时指挥官，布防于南关大桥，与日本军隔伊通河对峙。苏联进驻长春之后，军校学生就自行解体，各奔东西。

一部份暂时未能回家的学生，暂住在日本人留下的空房子

“竹中工务店”，补习功课，准备投考祖国光复后的学校。一部份学生在过去即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快地参加了革命工作。

有一部份同学毕业后分配到驻在哈尔滨的伪江上军任职，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前，组织了江上军的3个团的起义，使日本军大为震动。

还有一部份同学，在东北光复的政治动荡中，于1946年初去锦州向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请愿，被骗参加青年军二〇七师。1946年5月，二〇七师随国民党其它军队进驻长春，7月进驻辽源。经过半年的实践，这些学生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一定的认识，纷纷从二〇七师逃亡，其中的大部分人到新成立的长春大学学习。

还有一些军校学生参加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的第四总队，充任从排长至营长的基层军官。以后在这个总队的基础上，组成暂编第五十八师，曾作过军校教育部长的王家善任师长。王家善拉了不少军校师生充任该师干部。当五十八师在1947年驻守营口时，五十八师中的军校同学，在党的领导下，王明仁通过军校“北辰同学会”拥戴王家善，1948年2月25日宣布起义，全师编入解放军。

这个师在抗美援朝中入朝作战，有一些营、连长是军校同学，英勇捐躯。如英雄七连长孙降生、连长张敬模等光荣牺牲。还有一部分军校同学，1946年入沈阳东北大学就读。当中国的两种命运决战的1947年、1948年，在这里念书的一些同学，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

在长春大学读书的原军校学生，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政治态度已经逐渐明朗，有的人潜往解放区寻找光明，有的在长春寻找党的地下关系，投身于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为解放长春做出了贡献。

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如同掀天巨浪滚滚逝去。曾经在军

校学习过、工作过的中外人士等，有1500余人在中国大陆，有50余人在台湾。不论在大陆或台湾，始终从事军职的只占少数，多数人都又入了其它大学，从事其它职业。现在居住在长春的还有120余人，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退休养老了。在台湾的有两名将军，其它的大多经商。在日本的军校日人学生有900余人，从军的也是少数，其中有3名将军，大多是经营企业，有一部份在大学中任教。在南朝鲜的，在军界、政界的多一些，如在1979年10月26日被刺身亡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就是“军校”2期生。

（作者为军校5期生，解放后，离休前为长春市卫生局副局长，副厅级。）

刘启民

军官学校沿革

建校前的军官培训机构 为了培养军队骨干,1932年7月,伪满军最高顾问多田骏大佐,8月晋级少将,就有成立军官学校的意图,但因伪政权刚刚建立,成立军校要有许多准备工作,因此,采取速成的方针,于12月,在沈阳东山嘴子原东大管设立了“中央陆军训练处”,由邢士廉中将、李盛唐中将、郭恩霖中将、梅村笃郎先后任处长。任指导的称“先任应聘官”,是日本陆军预备役将官水町竹三少将。他是皇姑屯事件的肇事者,当时是“奉天铁道守备队”司令官(大佐军衔)。至1941年,从1期到10期共有1567名军官候补生毕业任少尉,作为伪满军的前期“中坚”分配到各部队,起到了控制伪军的作用。训练处于1939年改称陆军训练学校。

建校令的批准公布与建校准备工作 为了充实并发展“国防”力量,1939年3月10日,伪满洲国以公报第146号批准并公布了“陆军军官学校令”。

在此以前,伪治安部根据“关东军”的指示,着手在长春市郊拉拉屯建筑校舍,同时任命中央陆军训练处干事真井鹤吉少将等为军官学校创建委员,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

军官的创建沿革与概况 军官学校校址,在长春市净月区拉拉屯一带高岗上,建校当时称曰“兴亚台”。1941年6月20日,溥仪“临幸”,“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大将、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列席。伪帝下达敕语曰:“尔军官生徒,为朕股肱,宜愈尽瘁国军,朕深赖之。”同时将军官学校所在地址赐名为“同

德台”。

军校领导成员及任职时间

(1) 校长

郭恩霖上将	1939~1940年
南云亲一郎中将	1941~1943年3月
山田铁二郎中将	1943年3月~1945年8月

(2) 干事

真井鹤吉少将	1939~1940年
落合镇彦少将	1941~1943年
伊达敏郎少将	1943~1945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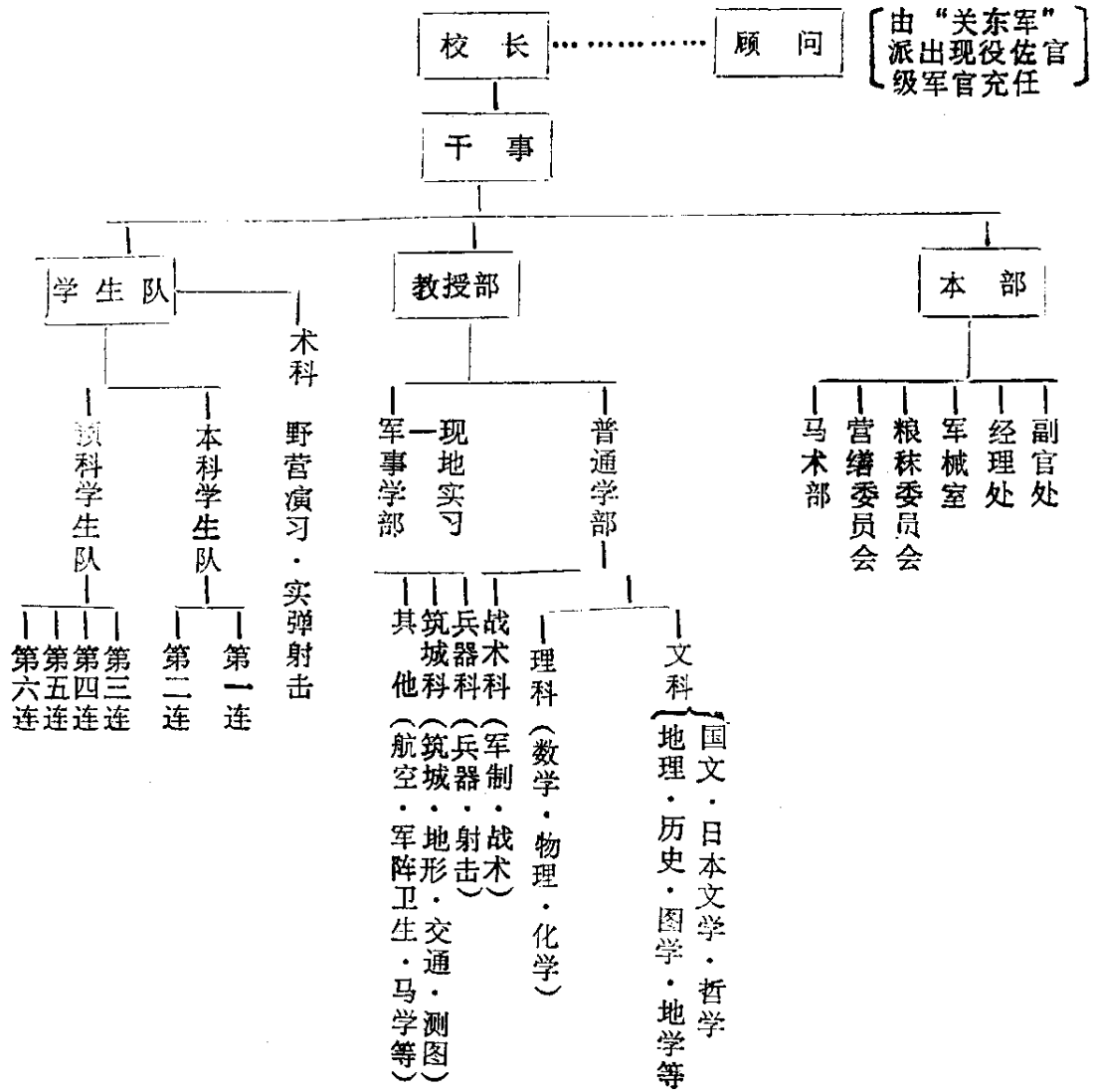
(3) 教授部长 (1941年以后充实)

王家善少将	1941~1942年
郭若霖少将	1942~1944年
?	1944~1945年

(4) 学生队长

河野满上校	1939~1941年
平川哲一少将 (代行)	1941年4月
川上明少将	1941年5月
秋山秀少将 (代行)	1941年10月
栾彪上校	1943年3月
樵铭远上校	1944年
杨 春上校	1945年

陆军军官学校组织系统表



注：1、本表仅供参考。

2、学生队下属连的番号非固定者，随学生毕业而改变。